

當代中國政治研究訪談

● 許慧文、任軍鋒

許慧文 (Vivienne Shue)，牛津大學Leverhulme教授，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專案主任，英語學界當代中國政治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197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師從著名漢學家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和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 (Ezra F. Vogel)。1976年至1982年執教於耶魯大學，之後轉入康奈爾大學，1995年被該校聘任為第一位從事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Frank & Rosa Rhodes教授。2002年8月正式受聘於牛津大學。



許慧文教授的研究領域涉及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史。從70年代後期開始，許慧文教授曾先後在中國內地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和實地採訪，足跡遍及湖北、四川、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等省區。她在1988年出版的《國家的範圍：中國政治體圖繪》(*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一書是80年代西方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中，「國家—社會」研究範式的標誌性成果，已被公認為英語學界中國政治尤其是基層政治研究的經典著作。許慧文教授的其他著作包括：《過渡中的農民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1980)、《束鹿：一個中國縣的政府與經濟》(與Marc Blecher合著) (*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1996)。許慧文教授目前主要關注的是中國政黨—國家合法化策略的研究，她正在撰寫《爭強好勝的權威：中國的政治合法化、共謀與反對》(*Agonistic Authority: Political Legitimation, Cooptation and Opposition in China*)一書。

以下是本刊委託復旦大學政治學系任軍鋒博士就中國政治研究方法的問題訪問許慧文教授。
△為任軍鋒提出的問題，▲為許慧文教授的回答。在此特向許慧文教授、任軍鋒博士致以謝意。

一 「懷疑式的移情」與學術作為一門技藝

△：首先，非常感謝您從百忙中抽空接受這次專訪！從您的個人履歷看，您從事中國政治研究至今已接近四十年。請問當初是甚麼力量促使您對中國政治和中國農民問題產生學術興趣的？

▲：說實話，我之所以長期以來著迷於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的父母。60年代早期，當我還在上中學時，我的父母就開始鼓勵我關注中國和學習中文。當時中國對於西方人來說幾乎完全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西方人對發生在中國的事件幾乎沒有多少深層次的或準確的掌握，當時我的父母和我自己都為此感到極為不安。我記得在家裏，我們經常討論政治問題，爭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政治變遷的種種可能性。1965年，我開始學習中文，並很快被它的美妙所深深折服。從此，我在學習漢語的同時，在大學開始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藝術、宗教以及烹飪。學生時期的我興趣非常廣泛，不過我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問題上。可以說，最終成為一位「中國通」完全是出於我的個人選擇，因為當我的學業行將結束時，我已經在學習中文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要是在這個時候我還想着去從事其他行當，那肯定是瘋了！

我之所以將中國的土改、集體化和農民政治作為我第一本書的論題^①，是因為當時我從我的老師那裏了解到，農民在發動中國革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是我能夠對中國政治

事務的過去和未來模式有盡可能深刻的理解，那麼我就能真正把握中國社會的農民基礎。我當時的想法就這麼簡單，或許有點單純。那是一個相當漫長的學習過程。

△：據我所知，您在中國農村曾經做過大量田野調查和實地訪問，這為您對中國政治的獨到解釋提供了寶貴的「精微細節」。在您看來，一位嚴肅的學者應當對其研究對象持怎樣的態度，尤其是當這種研究對象是由成千上萬活生生的人組成的時候？

▲：一方面，社會研究者應當與他的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相當重要。這種距離意味着一種不帶個人道德好惡的超然客觀、不偏不倚，這將使我們在實證分析過程中盡可能做到公允。另一方面，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往往夾雜着相當多的道德和情感因素，這就要求社會研究者至少在某些時候必須將他的個人理解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們活生生的經驗和境遇做比照。我認為這樣做旨在培育一種針對研究對象的**懷疑式的移情** (skeptical empathy)^②。假如沒有懷疑眼光，我們就無法創造出有說服力的學術或思想成果，而沒有移情，我們就不能賦予抽象的學術研究以生機，也無法向我們的學生或其他人揭示學術研究背後所隱含的現實意義。懷疑式的移情，我這樣說聽起來似乎很難做到，好像是要製造一種「乾水」(dry water)，或其他甚麼靈丹妙藥。無論如何，儘管社會理論家力圖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科學性，但他們畢竟也是人，有着他們自己的良知和道德信仰，所以在我看來，我們所從事的這

60年代早期，當我還在上中學時，那時中國對於西方人來說幾乎完全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西方人對發生在中國的事件幾乎沒有多少深層次的或準確的掌握。我的父母和我自己都為此感到極為不安。我記得在家裏，我們經常討論政治問題，爭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政治變遷的種種可能性。

一技藝實際上並沒有甚麼神秘的。一個人研究其他人的思想和行為，只要經過不斷實踐和練習，都能夠很自然地掌握這門技藝。

二 「本土」問題與「西方」範式

△：國家與社會、統治與抵制、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本土與全球、強勢與弱勢、變遷與延續、政治修辭與社會現實、社會結構／過程與人類有計劃的或偶然的行動、現代主義與本土主義、前現代與現代……構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張力，也是貫穿您主要論著的線索。從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這些張力是中國政治所特有的？閱讀您的著作使人常常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即您更多的是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而不是答案。是否在您看來，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下，提出能夠引起爭論的問題要比回答這些問題更為重要？

▲：是這樣的。我們常常會發現，社會科學家和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往往傾向於給出「答案」，而不是提出更多新的「問題」。但我始終認為，我們只有在確保自己提出問題的正當性的基礎上，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才有價值。也就是說，我們應當盡可能確保提出的問題是恰當的，不帶任何偏見，並能夠得到我們能夠發現和收集到的資料和資訊的支援。富有創見的研究者往往能夠使自己擺脫已有的帶有相當局限性的概念的束縛，不遺餘力去改進自己研究的問題的提法，並在研究過程中不斷修正，這樣我們便

可以從中獲益匪淺。有時我的確認為，我們所能夠做的最為有益的事情就在於通過我們的研究，揭示我們先前作為切入點的那些問題實際上是一種誤會，或者有失妥當。這樣，通過提醒相關領域內其他研究者避免思維陷阱，同時為自己的探索提供新的起點，這樣做就是在推進知識的進步。

你所列舉的那些二分法長期以來困擾着西方中國學界，不過其他研究領域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這樣的二分法反映了人們從二元對立角度進行思維的習慣，它是貫穿西方啟蒙哲學話語的強有力的線索之一，對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和解釋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你很有洞察力，的確，我的許多著作實際上都是旨在打破諸如此類的二元式思維，揭示那些所謂的「對立」實際上並非截然分立的兩極，而是以各種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也就是說，揭示這些所謂彼此對立的社會經驗範疇是如何彼此互為條件甚至辯證地聯繫起來的。

△：作為「國家—社會」分析方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您同時也指出了這一方法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危險：「假如我們在選擇範疇和對待材料上不夠慎重，那麼我們會發現自己的論述與其說是辯證的，還不如說陷入了迴圈。」為了避免這一危險，我們需要「開誠布公」(transparent integrity) 和「持重謹慎」(abiding modesty)，甚而至於「不惜陷入一種鑽牛角尖式的過度詮釋」(idiosyncratic overinterpretation)，這樣做是值得的，它能夠使我們將更多的背景、過程以及交互作用納入我們對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生存狀態的理

社會科學家和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往往傾向於給出「答案」，而不是提出更多新「問題」。但我始終認為，只有在確保自己提出問題的正當性的基礎上，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才有價值。富有創見的研究者往往能夠使自己擺脫已有的帶有相當局限性的概念的束縛。我們所能夠做的最為有益的事情就在於通過我們的研究，揭示我們先前作為切入點的那些問題實際上是一種誤會，或者有失妥當。

與美國學界在政治研究中往往熱衷於廣泛的且盡可能進行量化驗證的比較研究不同，我所倡導的方法倚重於不斷仔細的局部觀察，從中試圖做出更為廣泛的、大膽的概括。正是從這些似乎有些危險的概括當中，那些能夠推動更為成熟的研究的新概念經常會應運而生。我至今仍然認為，為了促使我們形成更有創造力的洞見和思想，還是值得鋌而走險的。

解當中。」◎您能否更為具體地談談您的這方法論陳述？

▲：你所引用的那一段話是我在多年以前寫的。你讓我對我當時的想法進行解釋，這實在太重要了，本應在許多年以前就形諸文字！我想當時我所擔心的是美國學界在政治研究中的這樣一種傾向：即作為對那些更為狹窄的觀察和局部個案研究的反動，研究者往往熱衷於廣泛的且盡可能進行量化驗證的比較研究。你可以發現，我所倡導的方法倚重於不斷仔細的局部觀察，從中試圖做出更為廣泛的、大膽的概括。正是從這些似乎有些危險的概括當中，那些能夠推動更為成熟的研究的新概念經常會應運而生。假如研究者在運用我當時所倡導的這一方法過程中不夠慎重，那麼在我看來，他們將可能面臨這樣的危險：即依憑那些根本不足為據的證據做出某些大而化之的論斷。儘管這是我們必須面臨的一個相當現實的危險，但我至今仍然認為，為了促使我們形成更有創造力的洞見和思想，還是值得鋌而走險的。我認為目前我們這一領域大多數出色的學者實際上正在踐行這一做法：即從他們所觀察到的某一小的細節中產生某種洞見，接着尋找進一步的證據以及更為恰當的概念，這些概念幫助他們推敲自己的洞見，並論證其一般的適用性。

△：在過去二十年裏，諸如「公民社會的崛起」、「國家的退出」、「民主化」……往往是中國社會科學語彙系統中的關鍵概念／語彙，但您的分析卻時常提醒讀者警惕諸如此類的「目的論方法或預設」，認為正在進行

的改革並不一定會導致公民社會的崛起④；後毛時代的改革「或許實際上並不意味着國家會放鬆對農民強有力的控制，而是一個重新合法化並得到進一步強化的國家權力在新的社會群體中重新站穩腳跟 (rerooting)，國家機器本身以新的更為有效的形式進行重組，重新進行人員配置，重新鞏固」；以經濟效率和行政合理化為要務的系統化「改革」並不一定能夠「使農民大眾的政治影響力或民主自由得到強化」⑤。在對待來自中國特定背景以外的那些概念框架方面，您對研究中國政治的學生有哪些建議？

▲：在我看來，無論是作為學者還是普通公民，我們都應當對一切形式的目的論持懷疑態度，而不管這種目的論所由以形成的理論是出自本土還是域外，遠方還是近鄰。我從自己這麼多年來所閱讀的有關歷史、政治以及社會的著作中領會到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教益在於：儘管人類行為和社會制度中可能存在某些有待發現的模式或規律（這正是社會科學家的責任），然而社會生活中的所謂必然性，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眾所周知，人類並不像碎鐵屑那樣遇到一塊強大的磁鐵的吸引就立刻一邊倒。人類社會始終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某些社會主體對那些具有強大「磁場」的社會力量的引力或壓力無動於衷；另外一些社會主體在原地打轉；還有一些則會想方設法向不同的方向扯動。無論如何，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實際的社會場域是由某一強有力的、單一的「磁力」支配的。社會生活的運行、社會選擇的作出，都是在那些處

於不斷對抗的社會力量、引力和壓力變動不居且非常具體的序列中進行的，出乎意料的事情時有發生，其中的可能性或許可以說難以窮盡。

三 「政黨—國家」及其 合法化策略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基調先後經歷了兩次範式轉向：即從舊的毛式「革命」和「階級鬥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現代化」理想；90年代初期則從「現代化」轉向「文化民族主義」^⑥。就「文化民族主義」的載體來看，90年代以降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似乎有兩股力量：一是表現為大眾化的「氣功熱」，另一股則反映在中國知識群體當中。就中國知識群體來說，如果說「現代化」理想最終被證明是一個政治陷阱的話，我們是否可以預期，整個知識共同體中日益增強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對他們來說意味着又一個陷阱？

▲：是的。我認為在任何社會，文化民族主義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需要警惕的陷阱。我們對自己所熟悉的事物、那些生活在我們周圍以及那些在長相或思維方式上與我們相仿的人有一種本能的偏愛，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二十一世紀，我認為我們應當力圖克服這樣的情緒。對於諸如此類的偏愛，我們已經司空見慣，它會模糊我們對我們所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洞察，有時甚至會使我們對於他者的真正

長處、需要或者痛苦無動於衷。在人類歷史上，與其他形式的各別主義(particularism，無論是民族的、種族的，還是宗教的)一樣，文化民主主義極其危險，而且具有極強的破壞力。假如我們有意為推動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對於這股力量的增強，或被用於滿足短期的憤世需要，我們不應當視而不見。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群體一樣，中國的知識思想界應當格外注意在教育下一代時的形式和模式。

△：您曾經指出，80年代的鄧改革派與先前的毛及其「極左派」在視野上都是「國家主義」的，即尋求富強。他們之間的基本差異「僅僅表現為手段而非目的上的差異」。就中國的政體模式來看，與毛時代的「蜂窩」結構相比，後毛時代的商業「網」結構可以說是實現「中國二十世紀統治精英夙願的更為便捷的途徑，這一夙願即迅速的、國家引導下的民族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⑦；您在另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指出，未來中國極可能走向「一種更為穩定的威權式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形式」，而不是走向民主^⑧。請問您如何評價90年代以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黨—國家認可的「村民自治」？從「國家主義」視野的角度看，它是否只是政黨—國家用以「包裹」基層農民超級上訪的一種權宜性的政治策略？

▲：是這樣。誠如你的問題所暗示的，的確，現在看來，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村民自治」以及其他類似的趨向可以說是一種旨在滿足國家主義而非民主主義視野的「權宜性政治策

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基調有以下兩次轉變，從毛式「革命」和「階級鬥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現代化」理想，90年代初期則從「現代化」轉向「文化民族主義」。我認為在任何社會，文化民族主義都是一個需要警惕的陷阱。在人類歷史上，文化民主主義具有極強的破壞力。在二十一世紀，我認為應當力圖克服這樣的情緒。

略」。但與其他政治策略一樣，諸如此類的舉措不僅可能帶來某些意料中的後果，而且會造成某些始料不及的影響。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善於構想社會藍圖，他們都善於採取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並且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進程，但他們都不得不面對許多與他們的目標相反的預料之外的趨向，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均未完全按照他們當初所設想的路徑發展，這兩位劃時代的政治領導人採取的「國家主義」視野和策略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既有「國家主義的」，也有「非國家主義的」，或者可以說是威權與民主的混合。在中國不遠的將來，不管其領導人有怎樣的遠見，在策略上如何高明，我認為同樣的情況還可能出現。

△：無論是在漢語學術界還是西方，中國政黨—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論題之一。然而您卻通過大量證據試圖說明：所謂「合法性危機」更多的是一種「矛盾心理的兩面」，所謂「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拒斥 (objection) 與接受 (acceptance) 的尷尬結合。「因為它是二價的 (bivalent)，所以人們在心理上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ambivalent)。圍繞權力自身合法性的訴求 (claims) 與反訴求 (counter-claims) 構成的旋渦中人們所體驗的自相矛盾的心理狀態，本身不應當……被說成是一種危機的徵兆。」◎請問您是如何界定「危機」的？在您看來，「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差別是程度上的還是有着實質性的差別？

▲：我恐怕並非以您所說的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看待合法性問題。統

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統治權即政治權力的合法化毋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中充滿了爭論、辯論、公開渲染、明示 (display)。掌權者不斷通過各種辦法和途徑為自己權威的道德合法性辯護，而那些權威的挑戰者則在一定程度上力圖說明掌權者實際上缺乏道德上的合法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各個方面，這樣一種訴求與反訴求的過程比比皆是，其中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和表達方式。所有體制，無論是威權的還是民主的，這樣的過程可以說是一種常態。

在絕大多數政治體制中，大多數公民之所以在有關他們的政治統治者的合法性問題上時常處於一種事實上非常自相矛盾的心理狀態，在我看來，恰恰與這一競爭性過程的不斷展開密切相關。圍繞究竟是誰 (為甚麼) 擁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形形色色 (直接的或間接的，顯見的或微妙的) 的訴求與反訴求紛擾着人們的視聽，致使他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無所適從。也許這正是導致許多政治體制中人們對政治和政治生活要麼缺乏自信、要麼厭惡反感的根源：大量看似真誠的相互矛盾的訴求和資訊紛至沓來，究竟哪一種才是可信的？人們感到無所適從，因此他們對政治極度反感。

一旦這種生機勃勃的社會論辯和爭執遭到壓制或銷聲匿迹，合法性危機就會產生。一種高度的威權體制完全主導一個社會的政治話語，致使其他形式的訴求和主張失去了任何公開表達的機會，這時爭論和明示就會在短期內遭到壓制。當此之時，統治者權力表面看上去似乎很穩定，但他們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善於構想社會藍圖。並採取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他們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進程，但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均未完全按照他們所設想的路徑發展，他們採取的「國家主義」視野和策略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既有「國家主義的」，也有「非國家主義的」，或者可以說是威權與民主的混合。

的權威實際上經常面臨突然崩潰的危險。在中國，這種合法性危機的「理想類型」在「四人幫」垮台時就曾出現過。

另外，如果掌權者的合法性訴求根本不能使公民大眾信服，圍繞道德合法性的生機勃勃的社會論辯也會銷聲匿迹，這時的情景就如同「皇帝的新衣」，普通人不再會有習慣上的無所適從感，他們一下子洞穿了統治者道德訴求內裏的空虛，這時候，在他們看來，統治者在道德—權力鬥爭中不再是可以接受的競爭者，而只不過是一種不可一世的傲慢自負，不僅非常滑稽，甚而至於顯得可鄙。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正接近於這樣一種合法性危機的「理想類型」。

△：您曾經指出，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政黨—國家的修辭與現實的社會行動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斷裂，這一斷裂所造成的具有諷刺意味的後果是：「與一個高度組織化而且有效的政黨—國家相結合的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革命運動日益墮落為一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體制，除了政黨—國家機器本身外，該體制缺乏任何真正的社會基礎，最終發現自己愈來愈難以進行合法的、有效的統治。」^⑨我們應當如何估價後毛時代政黨—國家的社會哲學與其治下民眾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鴻溝？您將中國目前的官方意識形態概括為「嫁接於馬克思主義的世俗的一民族的、實用主義—現代主義價值」^⑩，這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現實，並處於主導地位？它是否會再次導致「大範圍的、具有腐蝕性的異化、憤世情

緒以及其他形式的懷疑」，進而削弱政黨—國家的統治能力及其合法性？無論政黨—國家倫理是毛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革命式的道德理想」，還是後毛時代改革派的「世俗的一民族的、實用主義—現代主義」，我們是否可以說國家對社會道德的壟斷本身會弄巧成拙，它將造成廣泛的社會挫折感，進而削弱政黨—國家的政治基礎？

▲：在我看來，中國目前的情勢完全不能與最終引發「文革」及其流產的極「左」時期相比。儘管政黨—國家仍然有時採取極端強硬的手段控制那些實際上構成合法性基礎的社會話語的表達和訴求的提出，但從中國近年來總體發展趨勢看，日益走向更為公開的社會論辯，圍繞道德的要件、合法性以及統治權而展開的生機勃勃的、有針對性的爭論也日益增多，而不是減少。如今，中國的政黨—國家並沒有面臨失去其合法性的嚴重危險，因為它不再像極「左」時期那樣採取一切手段壓制批評者，導致其離心離德，這樣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也許你會進一步追問，政黨—國家是否會陷入另一種合法性危機的「理想類型」：即政黨—國家所宣稱的道德價值在民眾看來是反常的、荒謬的，就像「皇帝的新衣」，顯得可笑？這是一種可能。我發現，目前在中國某些廣闊的地域以及許多範圍較小的地方，一般民眾對於政府在道德上走向墮落的想法接近於這種形式的合法性危機。不過在其他地區，則更接近於一種生機勃勃的激烈的論辯，戲劇化的明示和反明示 (counter-display)，隨之而來的民眾自相矛盾的心態更接

如今，中國的政黨—國家並沒有面臨失去其合法性的嚴重危險，因為它不再像極「左」時期那樣採取一切手段壓制批評者。隨之而來的民眾自相矛盾的心態更接近於國家合法化的「常態」政治。目前中國這種讓人感到迷惑甚至「雜亂無章」的形勢，實際上可以認為相當正常且相當穩定。

中國的權力精英旨在建立並維持「一種更為穩定、更具有威權色彩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但隨着改革進程的推進，中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的複雜性將激增，政黨—國家很可能要面臨諸多非常嚴峻的挑戰。今後在一個多元化的政治秩序中如何實現明確的分權，以應對這一新的複雜性？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

近於我上面所談到的國家合法化的「常態」政治。假如你贊同我所說的爭論、合法性訴求與反訴求構成了政治生活的一種常態，那麼目前中國讓人感到迷惑甚至被某些觀察家視為「雜亂無章」的形勢，我們實際上可以認為相當正常且相當穩定。

當然，政治上的偶發事件並非沒有可能。對統治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力量聯盟來說，在他們應對大量不斷湧現的、對其合法性構成挑戰的因素過程中，需要保持格外的謹慎和靈活性。中國的未來是不確定的，並未事先敲定。

△：如您所說，中國改革的未來是不確定的，有着各種可能性，中國的歷史是在「深層的社會結構和過程」與「人類主體有計劃的或偶然的力量」之間微妙作用的結果。按照您對後毛時代中國改革進程的解釋，假如中國的權力精英旨在建立並維持「一種更為穩定、更具有威權色彩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您認為中國政黨—國家所面臨的核心挑戰是甚麼？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隨着改革進程的推進，中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的複雜性將激增，政黨—國家很可能要面臨諸多非常嚴峻的挑戰。在那些相對簡單的社會形式中，威權式的治理體制也許能夠維持相當長的時間，而隨着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結構日趨複雜多樣，分權便愈來愈難以迴避。錯綜複雜的多元社會需要多元化的治理體制管理其事務。毫無疑問，在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複雜性空前增強。在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政治秩序中如何實現明

確的分權，以應對這一新的複雜性？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①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② 此處以及下文回答(▲)部分中黑體強調部分乃許慧文教授本人所加，提問(△)部分中的黑體強調部分以及整個文本的註釋為專訪者任軍鋒所加。

③⑤⑦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9; 152; 129.

④⑧ Vivienne Shue, "China: Transition Postponed?", *Problems of Communism* 41, no. 2 (January-April 1992): 165; 159.

⑥ Vivienne Shue, "Global Imaginings, the State's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Pursuit of Phantom Freedom in China: From Heshang to Falun Gong", i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ed. Catarina Kinnvall and Kristina Jönss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210-29.

⑨⑩ Vivienne Shue, "Legitimacy Crisis in China?",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ed.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London: Routledge, 2004), 43; 38.

⑪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07.